

## 作者访谈

海南作家杨沫日前出版中短篇小说集《阿纳提的牵马人》(南方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这本小说集距她上一本小说集《飘逸的海岛》已经过去十年。十年磨一剑,虽然这期间杨沫还写过不少给她带来全国知名度的散文、诗歌、甚至剧本,但十年出一本小说集对于勤奋的她还是间隔太长了点,不过小说的分量可谓刀刻斧劈。日前海南日报记者对杨沫进行了访谈,杨沫的从容和远离尘嚣的安静让人印象深刻。



## 文坛观察

2月25日,由海南省作家协会、《小小说选刊》杂志、《百花园》杂志联合举办的“2012·中国小小说南方论坛”在琼海举行。来自辽宁、河南、广东、海南的约五十名作家、评论家、文学编辑、出版人,对“小小说”的创作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探讨。

### 方寸之地 空间无限

著名作家韩少功认为,小小说也是大舞台。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许多上班族要在地铁、公交车上花费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没有时间读大部头的作品,靠手机等媒介吸收信息,这就是所谓的“碎片化阅读”。小小说短小、耐读的特点,很符合当下都市人快速生活的需求。海南省作协主席孔见认为,当下长篇小说泛滥,小说“越写越长”。事实上,小说往长里写容易,往短里写难。篇幅短,对文字的质量要求就更高。

河南省作协副主席、《小小说选刊》《百花园》主编杨晓敏认为,小小说是平民艺术。平民艺术的质朴与单纯,简洁与明朗,加上理性思维与艺术趣味的有机融合,极其本色及看得见、摸得着的亲和力,使小说最大限度地还原为平民艺术。在一两千字的篇幅里,所有的艺术手段,只能用来为内容服务。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小说虽属方寸之地,却能提供出无限的艺术空间。

杨晓敏说,小小说虽然只有20余年的历史,但目前全国有近千家报刊发表小小说,每年的发表量达几万篇。已有上百人因其小小说创作成就而被吸收为中国作协会员,进入省市作协则更多。数十篇小小说作品被选入大中专教材,文学期刊中也有了长期刊载小小说作品的核心刊物。然而,小小说也存在良莠不齐的现状,只有把小小说文体置放在整个中国文学的大格局中去审视,真正接受严格而规范的理论关注,才会营造小小说发展繁荣的良好环境。

### 借助多媒体求共同发展

湛江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第四届小小说“金麻雀奖·理论奖”得主刘海涛说,在今天高科技环境下、特别是在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影响下,小小说的创作与发展、阅读与欣赏都发生了过去没有出现过的新现象。如今网络上很流行的微信、微小说、微电影、微课堂都对小小说的发展有影响。微小说、闪小说与小小说可以同步发展并互为借鉴、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小小说可以从两者学到更精粹的技巧;后两者也可以从小说中学习并探索怎样在文学极限中智慧地表达文学性的方法。

什么样的小小说是好的小小说?陕西画报社策划部主任、首届小小说“金麻雀奖”得主陈毓将小说比作一道菜。语言是小说的“色”,或诗意丰沛、或老辣洗练、或生动朴实;“香”是文字的品相、情趣、雅俗;“味”是文字的筋骨,包括知识的丰富和思想内涵的深邃等;“形”是布局,也是文本携带的节奏感。以小见大,即精微又辽阔,深沉的意蕴是小小说之“意”,相当于“器具”,有意蕴的小小说让人“三月不知肉味”。

### 海南“小小说” 立意深耐品读

2月25日下午,论坛还举办了海南作家符浩勇“小小说”作品研讨会,与会者对符浩勇的小小说创作给予充分的肯定。

评论家天井认为,符浩勇的小说善于从以对人物心灵拷问来剖析当代人面对诱惑时所持的态度,这类作品立意深远,构架微巧,值得品读。并且,符浩勇的小说善于从现场感观人物,透过精彩情节,激发人性思索。这类作品构思巧妙,别致,有震撼力。

海南师范大学毕光明教授认为,符浩勇以数量众多的小小说,营造了独特的艺术世界。他的创作基本都是现实题材,关注的是世道人情,从思想主题看多为道德小说、伦理小说。在变动的时代里,符浩勇更关心的是生活与人性中那些不应该被抛弃的美好的东西。倘有丑与畸变的出现,那它们更反衬出美与恒常形式存在的可贵与难得。

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张浩文说,文学创作中的“两难原则”实际上就是把人物置身于道德或法律的困境,让其左支右绌、进退维谷,在此过程中显示人物灵魂挣扎的艰难和情感抉择的痛苦。这种“两难原则”的熟练运用,标志着符浩勇对小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有着更加自觉与理性的把握。

# 女性写作是一个不断争取的过程

文 / 海南日报记者 蔡葩

海南周刊:你的日常生活都被写作占用,为什么这本小说集距上一本间隔了十年?

杨沫:我也发现这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事实。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说他的第一本书出版用了他十年,第六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只花了一年半时间。我的情形正好相反,第一本小说集用了大约四年,而这第二本却用了十年。我是个种树、摘果子但不会储藏的人,我总是需要别人帮我储藏,有人张罗着给我出书我就出,没人张罗,我的果子堆得家里、院子里到处都是,自己疏于窖藏,或者做成果酱。这十年,除了小说我还写过有些反响的系列散文、诗歌,写过两个长篇小说,两个电影剧本,但情形都差不多,都没有储进地窖。当然我没有责难出版环境的意思。呵呵。

海南周刊:好像你跟这个热热闹闹的时代有些间隔。你认为写作是什么?作家跟所处时代的关系是怎样的?

杨沫:不是隔阂,而是每个人与身处时代会有不同的关系。这大概更多与性格和世界观有关。世界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同样,作家也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我们最好不要如此判断:不写农民工的作家就是小资作家,他的作品就不好。作家的生态园里最好也是多样共生。至于我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实际上很简单,我们就生活在当下的滚滚红尘中,我们被外界所有的一切推着往前走,你能做的,就是边走边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表达方式罢了。在这个前提下说写作之于我是什么就比较能说清了。近30年在内地文学经历了伤痕、寻根、现代、后现代、新乡土、新现实主义等等之后,特别是在我本人也年过四十之后,写作在我看来是写出经验和认识。经验就是这个时代共有的或一类人共有的经验,比如说知识分子经验,比如说女性经验,当然也包括个人经验。认识就是对这些经验进行梳理后,自己可以达到的认识。这要借助一些古典的、现代的理论。比如借助女性心理学、女性主义理论等等来认识女性经验。

海南周刊:你怎么看女性写作?更深入地说,你是否忌讳自己跟时下颇具争议的女性感官写作混为一谈?

杨沫:不管女性写作叫个什么,女权主义写作、女性主义写作或者其他什么,它都是存在的,并且是一个不断抗争、争取发表、争取说话的过程。女性说的话在现实生活中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不太被看重,一种是被极其看重。可能我有些偏激,在现实生活中,女性的话语被极其看重的,要么与权力有关,要么与眼球有关,眼球背后是什么自然不言而喻。而一般普通的、中间层次的女性言说,跟同层次的男性话语相比,总是要弱,弱的层次千差万别。女性写作跟现实的情形大致一样,那些跟眼球有关的“女性写作”,被热捧或恶搞;而大部分女作家处于中间层次,她们的言说不被重视或者被轻看了,甚至一些女作家都不好意思说女性经验和女性的思考,她们更愿意声称“站在人类的立场”,这里一个根本原因是,女作家如果坚持书写本性的经验和认识,几乎一开口就处于劣势,这种劣势一个表现在话轻无人信,一个表现在被窥视。所以,心有惴惴的女作家们不愿进入这个“窄道”。但是,身为女性、女书写者,你说谁替你说呢?另一个性别的作者吗?这就像自家的孩子不自己养,要赖着让人家养。过去,养不起吧让人家代养,现在你有能力养,你就不应该推给别人。男作家作品里的女性毕竟是男性眼里的、转述的,有责任和勇气的女作家应该承担起这种思考和表达。我并不想说女作家从女性角度还是从人类角度写作哪个更高级,但是,严肃认真地书写女性经验和认识的,的确需要更大勇气。因为她面对的批评者一般都是站在习以为常的正统立场上的,而这所谓的人类正统立场,几千年来是男性指定和确立的。呵呵。

海南周刊:你是否认为自己是个有责任感的作家?

杨沫:我只能说,我是个对自己有责任感的人。

海南周刊:以往你的作品,让读者感觉你是一个视野开阔,内心强大的作者。《阿纳提的牵马人》,却让人读到了茫然、挣扎、无力感,而全书又弥漫着“善”的气息。你自己怎么看这种不同?而“善”又在你的生活和写作中是个什么位置?

杨沫:《阿纳提的牵马人》收录的十篇小说,多是这十年前半段写作的,你觉得这些作品过时么?如果你不感觉过时那可能说明,人类的一些感情是共通的,比如说茫然、挣扎、无力感、善等等,不会因为过了十年这些情感就不存在了。让她们不显得过时的另一个原因应该是语言,优雅的语言,在十年间是不会过时的。

另外两种阅读感受也可能是因为作者自己的变化。一个作者十年间思想不发生变化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甚至可以说,因为他(她)读书、写作,他(她)的变化比不从事这一行的人更明显,而且有“据”可查。作者,是伴随自己的作品成长、成熟的。“善”是个人气质,我坚持认为,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作品,一般不会落差很大。

海南周刊:对《阿纳提的牵马人》这本书你有什么期待?

杨沫:对于一个早已嫁出去的姑娘你还有什么期待呢?你只能希冀她在今后的岁月里静好,在图书馆或某人的手里安享她的旅程。再过十年,希望还能剩下一半不过时;再过二十年,还能剩下一篇不过时。



小小说选刊封面